

## 馬華文學的疆界化與去疆界化：一個史的描述

莊華興\*

### 摘要

馬華文學發展始終與外來力量分不開，其疆界也隨著外力的拉扯而變易。戰前三〇年代受中國左翼文學思潮影響，其主軸是反封建與反殖反帝，竭力呼應抗日。這時候大批中國文人南下避難，在鼓吹抗日之餘，作品中無不流露出流亡與懷鄉意識。這是典型南來文人流亡書寫的形態，具體反映了南洋文藝初始的精神內涵。戰後至六〇年代，馬華文學進一步受國共意識形態鬥爭的影響，轉向更為劇烈的左右寫作路線的頹頹，這時候，左翼現實主義與工農文學成為主流，其他思潮如現代主義文學皆被視為異端，成為打擊的對象。這個階段的文學生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有某種程度的契合性，除了訴之紅衛兵式的鬥爭模式，創作中也容納了模糊的國家意識。冷戰結束後，中國學界先後從「海外華文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概念出發討論馬華文學，收編意味濃厚，引起在臺馬華學界的反應，「新興華文文學」和「華馬文學」（華裔馬來西亞文學）理念的提出可視為在臺馬華學界的因應策略。但由於在臺學界以離散精神為主體，國家意識存而不論。與此同時，西方漢學界亦於九〇年代下半葉介入這場華文文學版圖重構的話語爭奪，史書美和王德威先後借「華語語系」概念突出了臺灣與馬華文學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並把馬華文學帶入中國—臺灣兩岸學界收編與反收編以及臺—馬連橫抗中的前沿戰線，而史書美把華文文學納入國家範疇的討論尤值得注意。本文嘗試從縱向勾勒戰前南洋文藝時期的流亡書寫至冷戰時期的左翼馬華實踐，以至當下後冷戰時代的曲折發展，及探討上述三個階段的創作精神內涵。

關鍵詞：南來文人、疆界、馬華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

---

\* 莊華興：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高級講師。

# airiti

## Territorialized and De-territorialized of th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Description

Chong Fah Hing\*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inseparable from the external forces. Its boundaries changed with the pull of the mentioned forces. During 1930s in pre-war, 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left-wing literary trend in China with the purpose of anti-feudal, anti-colonial, anti-imperialist and also anti-Japanese occupation. At that momen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literati refuge to the south. In response to anti-Japanese movement, their works full of nostalgic sense and showing the awareness of exile that form the typical style of writing of the literati. No doubt this reflects the spiritual content of the Nanyang literature. Till to the 1960s, th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s further influenced by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ideology conflict, hence steering intense antagonistic on the thought of writing. At this period, socialist-realism came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the focus on workers and peasants. Other thoughts such as modernist literature were considered alien, and became the object of attack. In certain extent,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at this stage was more or less the sa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Besides presented some sort of Red Guards style, also accommodated some kind of vagu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academia in China approached to the concept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discussing th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evertheless this showing certain degree of incorporation. Thus it cause reactions from the academia resided in Taiwan. The proposed of the concept of “New Emerg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can be seen as the strategies to coup with the situation. Due to the spirit of diaspora in the academia resided in Taiwan, the memory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absent in the academic discourse. At the same time, sinologists in the West also involved in this discourse of remodeling the territory of

---

\* Chong Fah Hing,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90s. Shih Shu-mei and David Der-wei Wang has borrowed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to improve the visibility of Taiwan and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he global arena, but unavoidable has brought about the action of incorporation and anti incorporation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to the forefront, and Shih Shu-mei of incorporating the Sinophone literature into the national discourse are especially worth to keep in view.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exile writings in the pre-war era to the period of local practice in the leftist writing, till to the post Cold War era as well a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o explore the spirit of writing in the above three stages.

Key words: literati to the south, boundaries,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literature

# airiti

## 一、前言

從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為起點，馬華白話文學的發展迄今已接近百年。在這段時間長流裏，馬華文學的母題是什麼？或說長久以來，馬華作家的關懷是什麼？其中不變的是什麼？如何形成？針對以上問題，方修一部文學史作了很好的解答。馬華文學在某個程度上代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文化內涵與意志，方修一部新文學史和一套大系，基本上證明它是一個集體意志下的產物，呼喚着新馬華人的精神家園。在書寫史和作者史之間，它的書寫史成分高於作者史。這就是為何馬華文學能夠凝聚一代接一代人的意志，前仆後繼的主要原因。<sup>1</sup>約言之，馬華文學的集體性內涵不外是圍繞在族群身份建構的「政治寫作」，縱使各時期寫作人的政治態度有不同的對應者。從這個角度審視，馬華文學可說是一部民族文學。因此，方修以書寫語言為軸心的馬華文學實際上就是「馬華（民族）文學」，本文從族群邊界或疆界的視角進行審視，原因在此。上述概念中，「民族」一詞之所以列於括號內，你可以說是著意突出它的整體義涵，但筆者毋寧相信它是「隱性的存在」(visible of the invisible)。它往往與外力的拉扯而隱顯浮沉。我以為討論馬華文學，這個「隱性的存在」是不可忽視的基本認識。

基於客觀現實的限制，族群權利在官方政策下難有保障，馬來西亞華人在精神上往往是有家無國的族群，這是殖民地時代至獨立建國後的基本狀況。但是，受文化祖源國從晚清以迄的國家想像與話語建構運動的衝擊，馬來（西）亞華人受感召產生了強烈的國家歸屬的願望，但同時全球與在地脫殖／反殖運動的催化，因而把情感轉化並投射在「此時此地」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中，由此突顯了馬來（西）亞本位思維。然而，這種趨勢並非線性的持續發展，晚近二十年中國的崛起，華社領袖為了趕搭經濟列車，凡事以大中華為馬首是瞻，文化界的在地耕耘也借全球化話語找到最好的遁詞。我仍記得上世紀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初，文化界和熱血的青年才俊無不熱衷探究「馬華文化」義理，<sup>2</sup>然而，今天這種話題幾成絕響，發論者或被認為不識時務。

<sup>1</sup> 根據馬崙在《新馬文壇人物掃描》中的統計，從 1825 至 1990 年，65 年之間，有 3183 位大小華文壇人物，參馬崙編著，《新馬文壇人物掃描》（馬來西亞：書輝出版社，1991 年）。出版物方面，據吳天才所編《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目錄》，從 1919 至 1975 年，馬華文庫有：一、詩歌約 192 本；二、散文、雜文約 210 本；三、小說約 400 本；四、戲劇約 48 本；五、評論研究約 45 本；六、詩文集、寓言及其他約 62 本；七、文藝叢刊約 66 本；八、文藝雜誌約 100 份。參吳天才編，《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目錄》（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975 年），序。以上所列不包含各報文藝副刊，而它卻是馬華文壇賴以延續的場域。可見馬華文學肩負著某種使命，這是它之所以為馬華的宿命。

<sup>2</sup> 一整套由戴小華領導的華人文化協會編輯出版的《當代馬華文存》是為最佳文獻。文存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五卷，各卷又分八十和九十年代兩冊，合共十大冊。其中，九十年代文化卷有不少文章探討「馬華文化」主體性議題。

基於隱性存在的本質，本文嘗試挪用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邊界概念，探討馬華文學在特定的歷史進程中，其疆界的伸縮和精神內涵的同構關係。筆者此處援用的「疆界」一詞，大體上可以對應於巴斯的族群邊界的說法（ethnic boundaries）。巴斯的一個重點指族群認同是主觀能動的結果，是借著自我歸屬（self-ascription）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歸屬（ascription by others in intersection）所產生，而非由研究者根據族群本身的文化所建立。在人類學界，馬來西亞華人族群的建構不完全以文化為判準，它往往因與外力拉扯、拔河的過程中確立它的族群性。這些外力包括祖源國和殖民主義因素，以及建國後的內外因素。從戰後至獨立後，馬華文學走得更遠，它已從族群邊界進入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疆界」版圖（territory）。在此處，「疆界」除了指地域的邊界，也隱隱指向國家與國家文學話語。易言之，談馬華文學的疆界的擴張與收縮，並非從研究者的角度根據文學系統本身的內容來勾勒馬華文學，而是透過它的疆界的伸展與收縮來決定它的主體性以及它與其他文學系統的關係。這種互動能力一方面在共同的語種文學中發生（如馬華—中國文學），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並不排斥非共同語種之間的滲透，終於造就當前「馬華文學」名稱義界的擴大。簡言之，即從傳統認知下的「馬來亞華文文學」向建國後國民教育體制下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學」過度。這樣的演變並不易為外人察覺，連帶地也影響了它和中國文學的臍帶關係，因此名之為隱性的存在。「疆界」一詞的採用也預示了馬華文學從「族群」到西方意義上的「民族」的轉換過程。

## 二、戰前中國文學疆界與大後方文學

馬華文學疆界並非是一個固著的狀態，方修在《馬華新文學大系》「總序」稱：馬華文學包括新加坡，馬來亞和婆羅洲以華文書寫，並能體現新精神新思想的白話文學。可見方修嘗試為馬華文學劃定疆界。然而，那只解釋了馬華文學的地理覆蓋面，並無法有效解釋馬華文學在抽象層面所能抵達的邊界，以及它和其他文學系統（尤其是同語系文學）的互動關係。在國家文學概念形成以前，馬華文學疆界經常受外力的拉扯而變易，連帶地也造成複雜的精神投射。

五四前舊文學時代，中國和馬華文學之間的疆界繫於地理因素而已，在世界觀與價值觀，中國—南洋（尤其指傳統漢文學時期）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繼承的仍然沒有脫離傳統「文以載道」的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馬華舊文學一方面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另一方面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尤其自十九世紀中葉已直接承受西方的殖民統治，一八二六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馬來半島西海岸成立一個稱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的新組織，作為開啟馬來半島殖民統治的橋頭堡。它把檳榔嶼、馬六甲、新加坡整合為一個單一的行政體系，並把檳榔嶼作為這個組織的行政中心。此三地也是華人南來先人落腳謀

生、開枝散葉，並在此地發展文化事業的據點。這時期出現的文化活動除了清政府駐新加坡第一任使節左秉隆創辦的會賢社，黃遵憲駐新任內也創辦圖南社，並把焦點投注在南洋風土和當地華人社會內部議題。這些文社（沙龍雛形）的創立，除了發揮教化功能，也為了排遣滯留南洋的身世飄零之感。此外，土生華人社會也參與辦報，如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薛有禮創辦《叻報》。表面上看，這些報刊都使用文言文，但其內容深受中國國內影響，逐步融入新思想、新元素，如《叻報》後期從擁護維新到鼓催愛國主義思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南洋商報《獅聲》上發表丘士珍（筆名「廢名」）的《地方作家談》，提出「馬來亞文藝」一詞。相對前人普遍使用「南洋文藝」一詞，中國文藝和馬來亞文藝之間的裂縫從認知轉變上看出來，也是馬華文學疆界逐步形成的時期。但這時期的疆界的形塑以中國傳統世界觀為主導，但不排除西方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價值的融合。

一九三〇年代的馬華文學，主要受中國文學和日本左翼文學的影響。中國作家當中，除了廣受歡迎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的著作在新馬廣為流傳；至於日本左翼文學，小林多喜二和德永直的作品都被翻成中文。一九三〇年以後，受魯迅《對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啟示，也為了深化對左翼文藝思想的認識，「左聯」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外國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研究會等等。隨後馬來亞也建立了分盟組織開展活動，並出版刊物。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中國左聯機關雜誌《北斗》刊載了馬寧的一篇通訊，題為《英屬馬來亞的藝術界》。文中結束語提道：

但最值得報告的，是馬來亞已經組織了馬來亞普羅文藝聯盟、普羅美術聯盟、普羅劇運聯盟、理論與批評聯盟等等，要向學校、工廠、十字街頭奪取群眾鼓舞群眾了！<sup>3</sup>

一九三〇年代初檳城《光華日報》副刊編輯部由馬共黨人掌控，對推廣革命文學占有優勢。馬來亞普羅藝術聯盟成立以後，即創辦機關刊物，發表大陸通訊。當時的新加坡不僅是歐亞交通的孔道，也是聯繫南洋各屬的樞紐，傳播與傳送各國革命的資料和出版物。左聯的禁刊就是透過這個管道流入新加坡。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帝國夾著軍事力量在世界各地進行的經濟搜刮終促成一九二〇年代末的全球性經濟恐慌。因此，一九三五年之前的馬華文學基本上是以反帝國主義為鵠的。這就是它初始的精神內涵，並且深受中國革命文學思潮的影響。這時期的馬華文學疆界，基本上受反帝國主義的牽制，並且把自身的命運和現代中國的大革命捆綁在一起。

這時候下南洋的左翼文人大多因避難而流亡南疆。他們在殖民地南洋看到種種引起憤慨的事情，形諸筆墨往往帶著憤懣與批判的風格與語調。但若仔細觀察，流放異邦的流亡心態往往不經意地流露出來。譬如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下南洋檳榔嶼投靠父親的年輕左

<sup>3</sup> 馬寧，《馬寧選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664。

翼作家馬寧，在《南洋風雨》一文中有非常真實的反映。在南洋的夜空下，革命情懷和心靈深處的懷鄉愁緒交揉一塊，不仔細推敲還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幻。初到檳榔嶼，他和父親同在天井後邊的小樓房裏睡覺。兩個人各一張帆布床，布床底下擱著一個小藤箱，那就是全部的家當了：

我們這小房裏雖然沒有電燈，可是前樓扶梯口的電燈並不吝嗇它的光明，十分喜悅地把光明投送到我這裏來。沒有關上的四扇大窗，接受了從屋頂通過天井射來的月光。我躺在帆布床上看不到月亮究竟在何處，但我終能看見她的光明。<sup>4</sup>

看不到的月亮，卻能看見她的光明——這是革命者的信念與大我情懷的升華；但它是在南洋某個夜晚某處人家的天井後邊的小樓房內發生的，大我與小我之間的揉合，充分彰顯了左翼美學，孰虛孰實已不重要。就精神內涵而言，戰前二〇年代末至三〇年代前期流寓南洋的左翼文人大抵如此，因此說南洋大後方文學是中國大後方文學的延伸並不為過，對馬華文學疆界構成影響之外力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三六以後，日軍侵華，大量文人隨國民政府內遷至重慶，有者奔赴延安，形成抗戰文學特區，如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七七事變以後，左翼文人紛紛離開上海，有者下南洋，在南洋大後方一邊宣揚抗戰，一邊支援中國的抗戰事業。這時候南下的文人不少，在南洋形成頗具規模的「大後方文學」。這裏的「大後方文藝」是按中國現代文學史敘事的國統區文藝、淪陷區文藝、根據地文藝（一九四三年後亦稱解放區文學）分法而出現的權宜性命名。它與前三者既有關係（戰後初期與根據地文藝的關係尤其密切），又自成體系，既被動又主動，端視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而定。可以說它是抗戰年代的特殊文藝生態，但不可否認它對往後馬華文藝產生持久性的影響，從中亦揭示戰前馬華文學意識的回環起伏，但始終未見顯著的結果。職是之故，說戰前至戰後初期南洋大後方文藝是中國現代文學版圖之一並不為過。猶有進者，大後方文藝不是一個外延或歷史概念，不必和抗戰文藝（literature of war resistance）或國防文學（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se）畫上等號，它純粹是一個內延性、自足的文學概念。具體而言，它是中國文學的延伸，是中國文學的外環文學（或稱海外戰地文學），因此是中國文學元系統的組成部分。就活動內容看，它不僅以國內動態為唯一的關照對象，亦把殖民地的反抗和國內的抗爭相提並論，其依附性由此可見一斑。

這個時期的馬華文學內涵依舊以反帝國主義為本，經濟的因素退隱了，國家意識卻大為加強了。不過，所謂國家意識，是逐漸由大陸左翼人士鼓吹建立的新國家觀，馬華文學疆界呈現模糊難以辨識的狀態。

<sup>4</sup> 馬寧，《馬寧選集》，頁 664。

### 三、「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的疆界協商

中共文人與其他左翼作家對國家的想像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獲得進一步落實。十七年文學所生產的革命歷史小說不僅為新政權的正當性奠定了歷史地位，更為國家想像提供了可能的方法。<sup>5</sup>國家想像在改革開放若干年後，在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協會的推動下，獲得進一步提升，並重新銜接上戰前大後方文藝的欲望想像。從一九八二年召開的「臺灣香港文學會議」為起點，接著主辦了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會議（一九八六）、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會議（一九九一）、世界華文文學會議（一九九三）。從會議名稱用詞上的更迭——從「海外華文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不僅是名稱的改變，國家想像也開始從內部想像拓展到更大的版圖疆界上。韓國釜山大學金惠俊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

這一系列名稱上的變化，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大陸學界對華人華文文學認識的變遷，同時也體現了其對華人華文文學認識的局限。中國大陸學界總是試圖將華人華文文學看成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乃至外部延伸。<sup>6</sup>

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無論在海外華文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的觀念、視野下，優秀的作品永遠無法獲得合理的重視，海外華文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僅僅流於書寫的存在，別無具體的意義。從 2012 年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了第十七屆，未見有一部可以代表華文文學分量的選集。中國學界的海外華文文學史或世界華文文學史著的出版確頗為可觀，然而，分席次的意味大於一切，對生活在族群政治霸權下的大馬華人，那與他們所熟悉的「分豬肉」規律有何差異？一般論者所關切的是作為中國本土根脈的海外華文文學如何在世界各國延伸和發展，<sup>7</sup>或簡單地把海外華文文學視為「一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全部歲月的中國『知識者』的海外流動史」。<sup>8</sup>這種狀況，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海外漢詩寫作年代（包括東亞、臺港、東南亞）殆無疑義。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以後，在抗日戰爭的衝擊下，單純的華僑政治效忠已產生質變，至戰後各民族政治思潮的激盪與匯合下，「知識分子的海外流亡」話語結構面臨最大的挑戰，傑出左翼小說家金枝芒是為代表人物。至今我們仍看不出在源流論底下，作品的深意和美學價值如何獲得正視？或更進一步：在源

<sup>5</sup> 國家想像的具體落實即為「國家文學」。中國學界近來開始對「國家文學」進行研究，但他們是把它作為一個描述和分析的概念（或現象）來操持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對中國當代文學提出反省與批判。論者分析的個案是與新中國共生的國家最高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筆者以為，除了國營文學刊物，學界對內對外的國家話語建構亦不容忽視，「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基本上從外部反觀了國家話語的建構。金惠俊，〈試論華人華文文學研究〉，作者為韓國釜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sup>7</sup> 饒芃子，〈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新觀點——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文學意義〉，劉中樹、張福貴、白楊主編，《世界華文文學的新世紀》（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

<sup>8</sup> 饒芃子、費勇，《本土以外：論邊緣的現代漢語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4。

流論底下，地方文化實踐如何獲得關照，更何況是那些已經跨越語言邊界的華裔馬來語文學（華馬馬文學）、華裔英語文學（華馬英文學）？此外，大歷史敘事凌駕文本分析與個案討論，意味著馬華文學（或中國文學）的疆界已經被人為地劃定了，文本分析與個案探討似可有可無。筆者有意指出的是，中國學界的海外華文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根本問題是過早地劃定文學疆界，連帶地也一概把它的內涵別黑白定於一尊。

二〇〇六年七月上旬，臺灣《聯合報》和香港《明報月刊》幾乎在同一時間刊登了王德威先生的論著《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提出了「華語語系文學」此一新觀念。<sup>9</sup>王德威首先為「華語語系文學」作了簡要的緣起性質的說明。歸納起來，它是呼應當前中國學界下列三點發展趨勢。一是相對於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國家想像情結，二為正宗書寫的崇拜，三為文學與（離散）歷史大敘事的必然呼應。由此出發，他以 20 世紀中期以來海外華文文學的駁雜現象，與及要求學界靈活看待國家與文學間的對話關係，確立「華語語系文學」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約言之，即以否定國家（非國家）、反中心和反正宗（正統）為基礎，並歸結到 20 世紀上半葉華人離散史的歷史敘事中。如果我們把「海外華文文學」與「世界華文學文學」觀念的提出視為中國文學再中心化—疆界化的新進展，則「華語語系文學」可理解為去疆界化的最佳詮釋了。

大概在同一時候，或更早，史書美也討論了「華語語系文學」。在對該觀念的理解與界義上，王德威認為華語語系文學不是以往海外華文文學的翻版。它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擴及大陸中國文學，並由此形成對話；<sup>10</sup>而史書美則詮釋為 a network of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utside China and on the margins of China and Chineseness, where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heterogenizing and localizing of continent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taken place for several centuries.（一個在中國以外和在中國與中國性的邊緣進行文化生產的地方的網絡，而這些

<sup>9</sup> 比王德威早兩年，史書美在清華大學學報中的一篇文章提起 Sinophone 一詞。實際上，此概念在華文文學界流通並非始自史書美，馬來西亞旅臺學者陳慧樺於一九九三年（民八十二年）五月《文訊》雜誌撰文談〈世界華文學：實體還是迷思〉已觸及此概念。他站在小文學（相對於中華文學圈）立場看待各地區華文文學與母體的臺灣文學、中國文學之間的關係，彼時他把 Sinophone 的中文譯為「華語風」。他舉一九九四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假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召開的第十四屆大會，提到華語風研究首次被提上西方漢學研究日程，將和其他區域研究如英語風、法語風、德語風和西班牙語風研究同列為大會議程。當然，他呼應的是劉紹銘和馬漢茂兩人合力推動的「世界華文學文學」概念。對應於華語風，他認為「世界華文文學」此一概念將跟區域文學（如新華文學、馬華文學、菲華文學、泰華文學、亞華文學、歐華文學、美化文學等）辯證地出現，其虛實可依照不同的視域與標準來組構、解構之。參陳慧樺，〈世界華文文學：實體還是迷思〉，《文訊雜誌》52 期（總 91 期），頁 76。把陳慧樺、史書美和王德威置於同一個脈絡，近年來的討論應可歸為「華語語系」的第二階段發展。前後期的不同是，首階段的華語風有意從後冷戰背景進行審視，第二階段的華語語系則從後現代全球化時代的跨界／越界流動出發；前者拋不開歷史包袱，後者始終拋不開國家。比較前後期，陳慧樺的觀點反而可以彰顯區域文學的主體性與主觀能动性。另外，他把「世界華文文學」的出現歸因於後冷戰年代的馬列意識形態的鬆弛、解體以及東南亞華人的經濟圈的隱約出現有關。顯然，以上兩個因素是相對於西方而言，但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以後陸續引起西方與中國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爭奪，以及對華語語系文學的關注與方法的辯證，頗值得留意。如果說中國學界是借世界華文文學對各地區華文文學的疆界的入侵，則劉紹銘和馬漢茂以降的西方漢學界是否試圖以之制衡中國學界？由此觀之，史書美和王德威將如何擺脫西方漢學版的「世界華文文學」意圖？各地區華文文學又如何可能在此學術戰線上維護其主體價值，包括在地感性的培植與昇華、語言的淬煉等。

<sup>10</sup>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臺灣《聯合報》E7 版，2006 年 7 月 8-9 日。

地方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把大陸的中國文化多樣化和在地化。) <sup>11</sup>具體而言，它就是包括所有中國境外華文文學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結合體。此外，他接受離散是一個歷史事實，然也有其終結的時候。「強調離散有其終時，因而是堅信文化和政治實踐總是基於一定的地域，所有人都理應被給予一個成為當地人的機會。」 <sup>12</sup>

這樣的說法似乎讓我們看到馬華文學發展的曙光，因為作為華語語系文學家族之一員，馬華文學借華語語系文學的便利找到了它和中國文學平等對話的契機，馬華文學在國際上的能見度理應可以大為提升了。

作為一個複雜的文化場，馬華文化資源的累積也並非全然匱乏，馬華文化場的形成，可以說包含了華人與大歷史互動下產生的心理結構變化。簡言之，馬華人從海外離散華人折入戰後冷戰年代的左右意識形態夾縫中，由此突顯了左右兩派華人的思想路徑與精神旅程。我們看到此時期部分的右翼華人的離散精神更為突顯，而部分極左人士的回歸意識也不遑多讓。然而，部分華人離散者和左翼華人也開啟了初步的合作，在新的居住地推行教化與認同，馬華教育領域推動者當中，林連玉、沈慕羽和林晃升分別代表三個不同思想背景的華人，並無礙於他們領導華文教育問題的抗爭，其最大的公約數（或稱粘合劑）無非是在地（華人）認同與國家認同，在他們眼中，兩種認同絲毫沒有衝突，這也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者的普遍認知。這種中間文化、中間族群並不易為外人理解，即便如著名東南亞華人史學家王賡武在他的論著中亦有意無意透露出他對華人的抉擇的不滿與微詞。對於圈外人，若以慣常的中原視角看這半華半洋（或半土）的社會，自然無法留意到它的變與不變，而輕易把它編入非此即彼的類別當中。其中一個最普遍的做法，是把華人納入戰後中國人飄零海外的離散話語結構中，是為唐君毅先生的「花果飄零」的浪漫敘事作了最佳的註腳。其二，有意無意把華人推向脫華入土的文化汰血境地中，形成空有物質形式而沒有實質華人內涵之概念。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它恰恰與目前在地當政者的思維不謀而合。此兩極化認知對新馬華人所建構的文化與思想內涵很難有恰如其分的理解。其原因或源於對華人居住地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變遷以及華人心靈的形塑沒有太大的興趣，連帶的漠視華人的國家認同，或予以否定。

檢驗華語語系概念的興起，它出於消解中心、去霸權，締造平等的對話機制為出發點。然而，如前所述，問題恰恰在於它對歷史與當下華人語境的漠視，轉而把焦點投向跨界流動／離散／流寓，因而難免對「恆常的流動狀態」帶有特殊的偏愛。回到歷史現場，需要論者的介入與長期的觀察，華人史、華人社群的考察也是對華人建立新家園，以及支使時間的方法的了解。前者是地理的位移、扎根乃至脫韁飄零，後者為華人現代性的表徵，不可同日而語。

<sup>11</sup>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4.

<sup>12</sup> 史書美 (Shih, Shu-mei) 著；吳建亨譯，〈華語語系文學概念〉，轉載於《馬來西亞華社研究》，第 14 期。

此外，在華語語系理念踐行者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分歧，以跨界流動（trans-border）與反離散之間的拉扯最為劇烈。王德威的平等對話對離散華人（或稱散居華人）有所偏愛，史書美則強調在地文化實踐，圖以之「抵抗離散」。史書美在一篇論文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即作了鋪陳<sup>13</sup>。站在馬華文學的立場，王德威的華語語系談法，在建構語系內部的對話機制之際，又如何看待馬華文學的在地實踐，或需要更多的闡述。史書美的在地實踐也流於片面，對華人現狀的理解並沒有提出可以參照的具體方法，史了解馬華的門徑，選擇從黃錦樹、張貴興兩人有意無意背棄創作倫理的文本切入，而黃張兩人的去國家文本如何可能（或不可能）發生在地實踐，而它恰恰是馬華文學的最大關懷，卻未必是史的重點。顯然，這是史版華語語系的問題所在。綜合史王兩人的華語語系概念，除了去中心、去國家的意圖，也包含了去疆界的作用，這大體是兩人的共識。對「包括在內」的華語語系文學的未來發展（特別是馬華文學），尤其值得注意。

王德威和史書美對華語語系概念的詮釋，無非投射了個人身份和成長歷程，顯然與個人的離散歷程不無關係，這是它的幽微之處。誠如法國象徵派大師保羅·瓦雷里（Paul Valery）所言：「There is no theory that is not a fragment, carefully prepared, of some autobiography.」（沒有理論不是片斷化的，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自傳）。史書美在韓國出生長大、接受當地僑校教育，大學時代赴臺考進師大外文系。我們從媒體上，無法對她的成長歷程有多少了解，但作為韓國華僑，成長後留臺，後來留美念研究所，這樣的歷程幾乎是冷戰年代國共對立格局下所有華人子弟的求學與上升之路。每個人的心路歷程容或有異，但每一段歷程總難免留下一些痕跡。因此，往後的學術研究若有什麼立場，大抵與個人的成長經驗、求學之路、時代和學術氛圍脫離不了關係。從這個角度看史書美提的「華語語系文學」，其所強調的邊緣性與反離散兩大核心與她的身份不無契合之處。

#### 四、小結

探討今日馬華文學，疆界是一個核心問題。它在極大程度上主導馬華文學的進程，也決定著馬華文學的精神內涵。文學的疆界一方面由客觀時代形塑而成，同時也交織著主觀的意志。文學疆界的具體化，在內，深受國家想像與國家意識的主導，在外，必須與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展開對話。作為隱性的民族文學，馬華文學沒有國家想像的基礎，卻有民族想像的實質，在國家文學的話語權力意志越來越強大的當下，馬華文學始終在民族想像中徘徊、彷徨，其身份屬性之弔詭，進一步突顯了它的離散特質，因此它向心的部

<sup>13</sup> 參 Shih, Shu-mei,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Jing Tsu, David Der-wei Wang (ed.).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分就這樣難免被抹除。這是當下新興華語語系文學面對的難題，即如何面向內／外權力中心，以尋求自身的定位。

# airiti

## 主要參引文獻

### 一、中文

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星洲，世界書局，1972年5月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聯合報》E7版，2006年7月8-9日

史書美著；吳建亨譯，〈華語語系文學概念〉，載於《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14期，2012年

吳天才編，《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目錄》，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975年

吳俊、郭戰濤，《國家文學的想像與實踐：以人民文學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金惠俊，〈試論華人華文文學研究〉（作者贈本，出處缺）

陳慧樺，〈世界華文文學：實體還是迷思〉，《文訊》第52期（總91期），1993年5月

馬崙編著，《新馬文壇人物掃描》，馬來西亞，書輝出版社，1991年

馬寧，《馬寧選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

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

劉中樹、張福貴、白楊主編，《世界華文文學的新世紀》，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年

戴小華總編輯；陳亞才主編；陸宇蓮、鄭雲城、謝愛萍編委，《當代馬華文存》，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2001年

饒芃子、費勇，《本土以外：論邊緣的現代漢語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龔顯宗、王儀君、楊雅惠主編，《移居、國家與族群》，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文學院，2010年

### 二、外文

BARTH, Fredrik.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pp.9-38.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SALMON, Claudine (蘇爾夢). "Taoke or Coolies?: Chinese Vi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rchipel* 26, 1983, pp.179-210.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Shih, Shu-mei,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Jing Tsu, David Der-wei Wang (ed.).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感謝三位匿名外審的細心審查，並提供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因時間所限，本文修訂暫無法徹底進行，他日出版必定作通盤思考。